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07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吴玲英, 聂青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透过儿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问题。一方面,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尽管在被技术“提升”后变得更聪明,但却遭受到身体的伤害和移情能力的丧失,呈现“辖域化”特征;另一方面,儿童机器人克拉拉则突破技术的同一化规训,表现出人性的温情,从而构成了对人类儿童身体的“解辖域化”。当技术主体拥有超人类主体性时,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便成为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的命题,从而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机融合的人机共同体,为未来社会建立开放、包容的肯定性主体关系提供伦理反思。

关键词:《克拉拉与太阳》;石黑一雄;后人类儿童;主体与主体性;人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046-06

高科技的发展已将人们带入后人类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身体边界不断被拓展,生存形态日益受到挑战,从而导致人与机器愈来愈难以区分。对此,后人类主义理论家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曾言,人类身体与计算机仿真之间、控制论机制与生物组织之间以及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或绝对的界线^①。换言之,后人类社会不再以人类为中心,人与机器的混融状态挑战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使人类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而后人类主义主张通过儿童来重新思考人类主体,并重塑对人类的认识^②。儿童由于在身体、情感和心智等各方面均处于成长期和上升期,因此,他们身上往往被寄予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但随着后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日益加剧,父母为尽可能地帮助孩子

赢得更多竞争优势而诉诸技术手段,全面提升儿童的能力。由此,儿童主体面临着被技术奴役、沦为“生成中的非人”(inhuman becoming)^③的风险。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 2021)透过人工智能儿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儿童主体所面临的主体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关注了小说中的“报废”(obsolescence)^④、情感书写、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及后人类语境下的人文主义哲思等主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尽管有学者论及了小说中后人类语境下传统人文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但却并未将这一挑战聚焦于后人类技术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危机,更未论及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在呈现后人类社会中的主体性危机方面发

收稿日期:2022-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WW05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98)

作者简介:吴玲英(1967—),女,土家族,湖南慈利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①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②Kromidas, M. "The 'Savage' Child and the Nature of Race: Posthuman Interventions from New York Cit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14, 14 (4): 422-441.

③Murriss, Karin. *The Posthuman Chil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hilosophy with Picturebooks*.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130.

④Parkes, Adam.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Planned Obsolescence in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22 (1): 13-27.

挥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拟聚焦于小说中的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探讨后人类时代儿童身体的“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管制、技术主体克拉拉所具有的异质性和能动性等“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特征,进而思考如何建构后人类时代人机互融状态下的新型主体关系,表达对后人类时代人类主体尤其是儿童,何以与技术主体和谐共存,以及如何构建包容与和谐的人机共同体等问题的省思。

一 “辖域化”的儿童身体

“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规定,是指18岁以下,不分性别、能力、民族或种族,且拥有与其愿望、认知相关的特定权利的年轻人。儿童发展理论将儿童排除在完全意义上的人之外,视之为“非人”(unhuman)或“成长中的人”(becoming human)^①,由此制造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立。儿童在与成人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则成为实现家庭和社会期待的重要媒介之一。小说中的乔西(Josie)14岁半,是其父母受后人类社会竞争文化影响、利用技术手段辅助而塑造的典型的“理想化”儿童。为使乔西变得足够聪明、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乔西的母亲克丽西(Chrissie)不惜冒着失去乔西生命的危险,借由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提升”(lift)乔西。由此,生物学上身体的自然演进被打破,致使“社会与生物学从根本上脱节”^②。而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的“理想化”实质上不过是其受到社会和技术的规约之表征,其身体呈现出“辖域化”的特征。

“辖域化”是指一种被禁锢或圈禁的状态,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和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以资本主义社会机器(Socius)对欲望的调控来说明辖域化:由于欲望自身具有革命性^③,因此社会机器在运转的过程中会不断对欲望的流动进行“编码、铭写和记录,以确保不存在任何一支未被封住、引导和管制的欲望之

流”^④。从这一描述来看,在辖域化状态下,禁锢者与被禁锢者之间构成一种权力关系,禁锢的目的即实现同一而非追求差异,其本质在于建构一个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霸权话语。小说中儿童身体的“辖域化”首先体现于乔西等人在自然身体方面接受的改造与“提升”,即利用后人类社会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改变身体内的部分基因,使其变得更加聪明。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巨大的未知,乔西母亲并没有放弃“提升”乔西的念头。以乔西为代表的被“提升”的儿童没有自己的主动选择权,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了满足父母和社会的期待。这一做法本质上依循的是启蒙时代以来的儿童发展科学逻辑,在这一逻辑下,儿童的身体和智力被精准地对待和分析。这固然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但他们过分强调儿童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儿童个体的差异性,更未考虑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儿童沦为父母和社会的构建物,成为符合同一评价标准的“优秀”儿童。而受压制的儿童则被动地接受父母为其描绘的“蓝图”,他们接受技术改造的身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禁锢、被“辖域化”的身体。

此外,小说中儿童身体的“辖域化”所导致的后果远不限于身体上的伤害,更在于造成了儿童同理心与共情力等内在情感的缺失,从而进一步消解了儿童的主体性。在乔西举办的交流会上,里克(Rick)成为被戏谑的对象与谈资,仅仅因为他并未像其他人一样接受过“提升”。当然,不可否认,经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的“理想化”儿童在学习与获取知识等方面的能力或许比里克更强,但他们的共情能力却极为薄弱。乔西在整个聚会过程中对克拉拉的态度都很淡漠,和往常一样始终将日夜陪伴她的克拉拉视为被动的存在,而非能动的“主体”。而里克在敏锐地捕捉到克拉拉的心理与处境后,毅然帮助被捉弄的克拉拉脱离

①Malone, Karen, et al. *Theorising Posthuman Childhood Studies*.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p.30.

②Prout, A. “Childhood Bodies: Construction, Agency and Hybridity”. *The Body, Childhood and Society*. Ed. A. Prou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3.

③Deleuze, Gilles,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116.

④Deleuze, Gilles,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33.

窘境。里克与以乔西为代表的“优秀”儿童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对比折射出未经“提升”与“提升”过的儿童之间的根本性差异。里克对克拉拉表现出的情感与同理心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内容,乔西等人则表现出人性的缺失。乔西体内的技术一方面提升了她的技能和知识,但另一方面,又阻碍和影响了生物体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情感的缺失则是其关键表征之一。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谈及后人类社会的生物技术时曾警示道:“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①虽然福山并未阐明人性中根本的特质具体指什么,但很显然,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核心特质之一,亦是确立人的主体性之重要依据。因此,身体遭受“辖域化”的儿童必须首先突破“禁锢”,踏上“解辖域化”的道路才是最终迈向建构起儿童主体性的关键一步。

二 “混合组装体”克拉拉的“解辖域化”

如果说小说中乔西等“提升”过的儿童象征着后人类社会儿童生命的技术化,那么以克拉拉为代表的用于陪伴儿童的人工智能朋友,则代表了后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另一倾向:技术生命化。从生命的技术化到技术生命化,转变的根本在于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丧失,代之而起的是技术的主体性。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主体性的丧失不仅体现在他们因身体被“辖域化”而失去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更表现为其同理心和共情力的缺乏。而后人类技术主体克拉拉作为儿童陪伴者却表现出远超人类生命主体的主体性,因此以另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构成对人类“辖域化”儿童主体的“解辖域化”。

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最初将“解辖域化”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但这一概念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外延,其本质在于通过在原有的系统中引入异质性元素,从而打破同一,弘扬差

异,在多样性的差异中找到一条“逃逸路线”(a line of flight),最终沿着这条“逃逸路线”实现对辖域管制的突破。克拉拉作为儿童群体中的一个异质性元素,其存在本身即象征着对后人类社会儿童身体之“辖域化”的解构。

首先,克拉拉所具有的“混合组装体”(Hybrid Assemblage)特质成为其差异性存在的重要前提,而这一差异成为其突破后人类社会儿童身体“辖域化”之禁锢的基础。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克拉拉与乔西的相处和交流模式与现实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几乎无异,但她不同于人类生命体,是一个用于陪伴儿童的人工智能儿童机器人。这一“混合组装体”特征使克拉拉成为“一种将人类主体和技术主体链接、铰合而成的新型主体”——“赛博格”(Cyborg)^②。如果说被植入技术的有机体处于赛博格的初始形态,人类的本质尚未被完全改变,那么被赋予人类情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则是赛博格的另一种形态,对人的主体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克拉拉作为技术和人的混合组装特征赋予了其主体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和生成性的特点与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组装”(assemblage)概念不谋而合。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组装的概念阐释其关于机器的思想。在德勒兹看来,机器的特点正是在于它没有封闭的同一性,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不同元件的组装构成了机器生成的主要方式,机器生成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恰恰在于生成过程中不同元件之间所产生的关联^③。元件不断通过组装生成新的机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辖域化”“解辖域化”再到“再辖域化”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看,克拉拉正是由于其独特的混合组装方式(技术生命化)构成了对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生命技术化)的“解辖域化”。

其次,克拉拉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构成其对“辖域化”儿童身体之“解辖域化”的又一重要条件。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有着超越人类的身体敏感性。正是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知,克拉拉有了和乔西第一次透过橱窗的心

①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②林秀琴:《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③陈永国:《德勒兹思想要略》,《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灵交流,为她日后成为乔西的人工智能朋友埋下伏笔。克拉拉不仅感官知觉敏锐,而且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能够对他人进行想象性移情。这种移情能力建立在克拉拉具身性的身体基础之上。具身性主要指人类的认知来源于经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其本质是对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的反驳。建立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上的身体观念具有离身性(disembodiment)的特点,即强调心灵或情感与身体的分离。基于控制论的机器人技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离身化的身体观念,试图通过将人类的大脑或意识植入机器,从而实现人的身体与意识的分离。小说中的克拉拉虽然本质仍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但她不仅拥有仿真的人类儿童身体,而且能够通过其身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换言之,在克拉拉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具身性的、在场的身体,这一具身化的身体构成了克拉拉建构其主体性的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克拉拉具身性的存在构成了对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的“辖域化”身体之“解辖域化”,在后人类时代为突破对儿童身体的同一化规训之限制提供了一条“逃逸路线”。

最后,作为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对乔西所展现出的绝对负责态度从伦理的层面体现了其超越人类赛博格主体的能动主体性,从而对被“辖域化”了的儿童主体性构成了“解辖域化”,为后人类社会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警示。进入乔西的家庭后,克拉拉承担了超过普通儿童人工智能朋友的陪伴功能,肩负起对“绝对他者”^①的伦理责任,表现出对同伴的深切的关心和人性的温情。而克拉拉最后被丢弃在堆场的命运与其无私的付出和奉献形成对比,这进一步揭示了人本主义传统下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所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尽管乔西和克拉拉都可以算作后人类赛博格主体,但二者在情感上的差别构成我们理解其主体性的关键。乔西身为人类儿童本应具有人所独有的伦理情感,但技术化的身体却令她丧失了这一建构其作为人之主体性的基础,而克

拉拉作为技术主体则被赋予了超越人类生命主体意义的能动的主体性,不仅像人类一样拥有丰富的感情,而且能够基于情感体验做出超越一般伦理标准的伦理选择。因此,可以说,克拉拉以其异质性新型混合组装体之存在本质、具身化的身体以及其在伦理层面的能动主体性实现了对被“辖域化”的后人类儿童之主体性的“解辖域化”,从而为重构后人类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三 交互主体:人机融合下的新型后人类主体观

随着后人类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面对赛博格格式技术主体之主体能动性的张扬和提升,遭到技术渗透和异化的人类主体将何去何从?换言之,人类主体和技术主体如何在后人类时代和谐共存?这成为重构后人类时代的新型主体关系的关键,更为理解新型儿童主体关系提供启示。

小说中身体受到技术和社会“辖域化”的乔西,象征着后人类社会试图通过技术提升身体边界能力、实现“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理想但却反过来被技术奴役或成为异化的人类儿童主体。而作为仿生智能机器人且拥有超越人类主体性的技术主体克拉拉,则隐喻着后人类社会赛博格格式技术主体给人类主体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克拉拉作为儿童智能机器人,在小说中被赋予了超出一般智能机器人的学习与模仿能力。在乔西的母亲看来,如果乔西因为身体状况离开人世,克拉拉便可以延续乔西。除小说第一部分乔西与母亲在商店选购人工智能朋友的情节对此有所暗示外,石黑一雄还重点借由摩根瀑布之旅和卡帕尔迪先生(Mr. Capaldi)为乔西画像的情节反复聚焦这一议题。以卡帕尔迪先生为代表的乐观主义理性者认为,机器与人之间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别。而乔西的父亲保罗(Paul)则坚信“每个人内核中都藏着某种无法触及的东西,某种独一无二、无法转移的东西”^②,即“人

^①“绝对他者”(The Absolutely Other)的概念源于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强调他者的绝对性,即他者是超越自我之外意义上的绝对他者,不同于传统同一性哲学视域下的他者,绝对他者永远不能被划归入自我所代表的同一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他者是一个超越无限的存在,这种绝对的他异性(alterity)要求自我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避免以自我的立场去化约他者,而是要将他者视为绝对的异己之存在,肩负起对他者绝对和无限的伦理责任。参见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76.

^②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64 页。

心”,因此他极力反对乔西母亲和卡帕尔迪先生的“延续”计划。

围绕克拉拉是否延续乔西的争论表面上反映了后人类时代机器能否取代人的命题,但实质上却揭示出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卡帕尔迪先生的观点代表着后人类社会人类主体对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态度。然而,这一盲目乐观的态度经过发酵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具颠覆意义的后人类主义:技术奇点后人类主义。对于乐观者来说,技术奇点的到来固然可以令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从而造福于人类,但它更多暗示的是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与危机,甚至“未来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人类发明的技术会让自己落伍”^①。卡帕尔迪先生拜访乔西母亲时谈及的社会上对人工智能朋友所持有的一种十分普遍而且不断增长的隐忧^②,正是出于对技术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担忧。这类担忧本质上反映了与上述理性、乐观主义观点相反的另一极端倾向,即认为人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面前主体能动性消解,人类的发展由技术决定甚至被技术替代的悲观主义末世论观点。

通过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并置,石黑一雄意在启示人们思考后人类时代如何处理人类儿童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享有独特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人能够凭借对技术的合理利用实现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因此构成了“一种解蔽方式”^③,人通过技术得以把握并接近存在的真理。然而,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仅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这一传统技术观为他反思现代技术对人主体性的遮蔽和消解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解蔽存在的方式不是依循规律的自然显现,而是一种“促逼”^④。然而,人作为促逼和摆置技术的主体却在此过程中也同时被卷入技术对人的促逼和摆置之中。换言之,现代人在追求技术的过程中异化了自身,进而丧失了其本应享有的主体性。而正处于成长中的儿童的主体性更为复杂,因为儿童的主体性本

就处于建构之中,尚未完成。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儿童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儿童在面对技术对人的异化时,遭受更大的主体性危机。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儿童复杂的主体性恰为考察后人类社会中的主体性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小说中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沦为后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的存在隐喻着人类主体的普遍异化和“被禁锢”状态。与此同时,现代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亦赋予机器前所未有的能动主体性,并因此危及和挑战着人类主体,尤其是儿童主体的存在。具有人类意识和情感生命的儿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通过向绝对他者乔西展示其无限的伦理责任,彰显了其超越人类的主体性。由此,人与技术的关系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在人机共存将成为常态的后人类时代,如何超越这种二元对立、重构新型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机融合或人机一体作为后人类的关键性特征之一,为我们思考重构一种交互式、互为主体的新型后人类主体关系提供了启示。这一新型的主体摒弃了传统二元对立视域下自我和他者的对抗性关系,主张人类和机器互为“构成性他者”^⑤,强调主体的混杂性、异质性、流动性和主体间性,其本质是游牧的和去中心化的。无论是人类主体部分还是技术主体部分,他们在保留各自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平等对话的和谐关系,最终建构起一个多元、开放、伦理的肯定性关系主体。

结语

《克拉拉与太阳》的中文译者在译本后记中指出,小说延续了一个典型的石黑式命题“人心”,不过这个命题却因被置于后人类社会图景而得以升华。如果说石黑一雄在《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 2005)中聚焦了后人类社会中克隆人与正常人类之间的情感伦理,那么《克拉拉与太阳》则将这一后人类图景进一步延伸至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问题。小说中,身为工程师

①默里·沙纳汉:《技术奇点》,霍思亮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XIII页。

②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373页。

③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1页。

④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2页。

⑤周敏:《人机共同体想象:以〈像我一样的机器〉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的乔西父亲保罗首先向人工机器克拉拉抛出关于“人心”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而由克拉拉在小说结尾对该问题做出最终的肯定性回答。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石黑一雄有意借两类不同人物的视角在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向读者探询,当面对无处不在的机器时,人何以凭借其独特的主体性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小说中的儿童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后人类时代人的主体性这一议题提供了绝佳的渠道。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当人与机器的相处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时,如何处理人与

机器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机共同体成为后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议题。虽然石黑一雄在采访中坦言他对技术的进步并不排斥,但他坚信,人要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方能与机器和谐共存。小说通过书写克拉拉这一人机混合的赛博格主体之生命历程,展现了重构一种人机融合的后人类交互主体的必要性,而这对于我们在后人类时代重新认识人之主体的主体性有着深刻的启示性意义,更为未来建构起包容、和谐的肯定性主体关系提供伦理反思。

Posthuman Child Subject and Subjectivity in *Klara and the Sun*

WU Ling-ying & NIE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latest novel *Klara and the Sun* (2021) explores the issue of children subjects and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posthuman er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I child robot Clara. On the one hand, although the posthuman children represented by Josie become smarter after being “lifted” by technology, they encounter both physical defects and loss of empathy, hence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rritori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I child robot Clara breaks through the discipline of technology for children, and shows the warmth of humanity, manifesting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human children's bodies. When the subjectivity of technical subjects exceeds that of the hum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ubjects and technical subjects will become a proposition that humans have to rethink,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new type of human-machine community, supplying ethical reflection for establishing an open, inclusive and positive subject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society.

Key words: *Klara and the Sun*; Kazuo Ishiguro; posthuman child; subject and subjectivity; human-machine community

(责任校对 朱春花)